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美] 费士锋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2月



《行万里路》
张聪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



《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以色列] 阿里·沙维特著
中信出版社
2016年1月

为何偏偏是湖南人?

禾刀

正是因为近代湖南人抵抗精神与现实形势频繁结合,才有效助推了历史进步

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反清革命领袖中有一半是湖南人,同盟会中湖南籍成员最多,而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则有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湖南所产生的改革者、军官、革命家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

通过拼接近代湖南人群体的精神路线图,裴士锋相信,屈原当是近代湖南人极易追溯的第一个精神高地。不过,屈原更大程度上只是为湖南人提供了精神地标的象征意义,真正激励湖南人奋勇实践、克难奋进的,当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王夫之。

屈原与王夫之,二者均具有抵抗特质。前者以最为激烈的方式纵身跳进滚滚的汨罗江,后者则是在反清复明的行动努力失败后,退隐乡野,以潜心学究的方式,图谋拓展反清复明的精神纵深及外沿。从屈原身上,湖南人读到的更多是抵抗。王夫之则除了抵抗,还包括对汉族的深深反思,这种从忧思出发的精神有效结合了他反清复明的行为实践,因此,对湖南人更具有可操作性指引意义。

虽然近代湖南人的精神图谱总体上以抗争为主基调,但又发展出这么两个明显区别的不同向度:一是崇尚激进刚烈抵抗的方式,哪怕视死如归,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比如谭嗣同、唐才常、杨毓麟、黄兴、蔡锷等人;二是既充分吸取王夫之的抗争精神内涵,又能有效结合时势对抗精神进行适当改造,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杨度,尤以有过外交经历,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郭嵩涛改造为最力。

虽然认为清廷的确无能,但“郭嵩涛不主张革命”,这一点与王夫之的抵抗出发点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在亲身体验英国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回到家乡后,郭嵩涛立即深陷两难困境,一方面渴望迅速传播西方发达工业文明,造福于乡亲;另一方面又不被乡亲们认同,处处受阻。对郭嵩涛而言,弘扬王夫之的精神显然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在郭嵩涛看来,家乡精英阶层即便对他郭嵩涛再如何心存不满,在弘扬王夫之的精神方面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共同语言的。郭嵩涛显然太过乐观,他所倡导的那些理念直到百年后才真正为人们所重视。

毫无疑问,自太平天国以来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几乎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抵抗为近代湖南人提供了形形色色革命的精神动力,这是近代湖南人不变的精神内核。正是因为近代湖南人抵抗精神与现实形势频繁结合,才有效助推了历史进步。

毕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除了近代湖南人,其他地方的许多精英亦在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自抛头颅洒热血。只有当近代湖南人精神与其他地方的大多数精英的奋斗方向一致时,其产生的聚合力量才足以推动历史的车轮破难前行。

历史似乎给近代湖南人开了一个玩笑——近代湖南人前仆后继致力推翻的满清政府,最后没有按照他们设想的脚本覆灭,而是在一座叫武昌的城市,因为一起意外事件引发的革命才得以退出历史舞台。这或许表明,湖南人精神的确很重要,但并非推动近代中国历史的唯一力量。

宋朝穿越旅行指南

林颐

宋代优待文人。文人大多当官,官员三年轮换,经常迁徙流动,即「宦游」

如果你想穿越去宋代,推荐你先阅读青年历史学者张聪的作品《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作者平易的文笔、趣味的选材让本书显得亲切。我们不妨化身时空旅行者,沉浸到历史的情境里,好好领略这种难得的体验吧。

张聪目前任教弗吉尼亚大学,她怀着极大的乐趣阅读了大量的史书、宋人诗词和散文游记,“这些旅行者的博学、对事物的好奇心以及他们与沿途地方和人民交往的能力使我印象深刻,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们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的旅行,以强有力的方式改变了旅行者自己,而且也改变了国家。”张聪希望通过这本书把这些改变充分地展现出来。

本书一共八章,囊括了旅行的基础设施、公文手续、送别仪式、人文景观、名胜与地方史等各个方面,此书在手,可以放心穿越啦。办理身份时建议点击“文人”。

宋代优待文人。文人大多当官,官员三年轮换,经常迁徙流动,即“宦游”。要么官府报捐,要么亲友资助,自己很少掏腰包。范成大爱用“万里”入诗,燕山首句云:“万里汉家使。”桂林云:“万里汉都护。”成都云:“万里桥边客。”他所说“余于南北西三方,皆走万里”虽有夸张,但亦足见宦游范围之广。旅途中有随身军士挑担、护卫,可乘坐官船或车马轿子,遇到馆驿客棧皆可投宿,各地方官府都有接待任务,沿途还有幕名的乡绅前来相邀,顺便观光风景名胜,这一路停停走走,惬意得很。

鉴于宦游可以拥有如此多的特权,因此验明正身很重要。准备启程前一定要办理好相关公文和手续。需要向吏部登记和汇交本人的任命文书,包括告身和黄牒,还有历子(历年工作档案),然后跟礼部索要官印。张聪特别强调了材料的特殊性,比如用于制作文书的丝织品是专供官府使用的,其颜色、品质和纹理都有严格要求。另外,虽然没有现代的照相技术,使用者的画像和文字介绍还是相当传神的。

一句话:防伪防盗,违者必究。
宋代虽然没有宽阔的大马路,但是驿道四通八达,水路畅通宽阔,山径则有驴马代步,倒是比现代旅行更多了一份“慢游”的乐趣。张聪把长江称作“宋代交通系统的生命线”,航船舟行,不仅可以观赏两岸风光,还可以看见来往穿梭的商船,宋代之繁华,未必都在东京,长江更加蓬勃活泼,若是平稳的分支河道,我们还可以换乘蚌舫舟,像李清照那样在藕花深处与鸥鹭争渡。

宋代文人是爱写文章的,也是最爱写文章的。“柳色西門路,看公上马时。亦知非久别,不奈自成悲。”陆游所写的这几句是典型的描述送别朋友赴任场景的诗。酒、诗和友谊,每一样都不可缺少。所以,如果穿越,我们要学会文雅地吟诗弄曲。

如果是像苏轼这样的大文人,那么恭喜你,你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陕西凤翔、湖北黄州、浙江杭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将会永远铭记你的名字,因为你就是意味最深远的人文景观的组成部分。

高水平的文人精英不仅是旅行的参与者,还可以成为文化的创造者。让这一趟宋代的想象之旅,开启我们的文化传承之旅。

在历史长河打捞失落的身份

叶辰

诚然,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没有国王,也没有父亲。我们没有一致的身份,也没有连续的去

“我是谁?”代表了人类的终极求索。对于犹太人,这问题本身就溢流悲情,在数千年的时空中回响不绝。以色列作家阿里·沙维特的《我的应许之地》是振聋发聩的又一次追问,见证以色列这个独特国家的诞生、崛起与反思,呈现犹太民族的百年荣耀与忧伤。

那是一种来自原乡的呼唤,永恒的乡愁凝聚了共同的意志。惟有听见这一声声呼唤,我们才能理解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意义,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纷涌而至,甚至不惜舍弃原本尚算安逸的生活,甘心将自己和家人投入不可知的未来。本书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诚然,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没有国王,也没有父亲。我们没有一致的身份,也没有连续的去……然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儿的,我们因此而联结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就成了命运路途上的手足兄弟。”沙维特的文笔流露深情,更以深刻的省思剖辨以色列的成败兴衰。

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比如赫伯特·本特威奇,还有该运动的发起者西奥多·赫茨尔等,他们身上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背井离家、筚路蓝缕,他们绝望而坚定地紧紧攫住这块土地,用青春和热血灌注的柑橘园是美好生活的象征。但是,宁静只是表象。犹太复国运动不是一种对遥远过去的回归,因为他们所想象的应许之地——有领土的民族国家,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新巴比伦之囚”时就被历史的风沙湮埋,这个运动在19世纪出现是一种革命性的创造,这是建基于犹太人在宗教思想与传统上对以色列土地之联系的一种意识形态。以色列建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盘根错节的过去早就埋下了一颗颗地雷,这就要求建设者要小心谨慎地移除,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引爆它们。

沙维特的失望正因如此。面对“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推进西岸地区的行径,沙维特发问,“奥弗拉(第一个定居点)究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良性沿袭,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恶性变异?”答案是——两者兼备。犹太复国主义是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是一个殖民主义事业,它打算以驱逐一个民族的方式拯救另一个民族的命运。报复引起报复,暴力引起暴力,战争引起战争。这样无休止的循环,只会让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变得面目模糊。曾经的信念像雪崩一样消融,年轻一代厌倦了历史强加的烦恼,他们宁愿醉生梦死、长夜春宵。以色列的锐进力量迅速削弱,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日渐松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未来路向何方?

正如沙维特所揭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是身份的革命,这种身份革命是诱人而危险的,如果处理得不好,“我们将再也不能识别出我们自己,我们将不能确定我们究竟是谁”。《我的应许之地》启示国家的领导者,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需要提供空间让那些少数族群安身;也启示我们,生而为人,我们究竟是谁。即使上帝不允许建造巴别塔,人类也应当学会相互诉说,相互倾听。

读品书好